

明代 志怪传奇小说研究

陈国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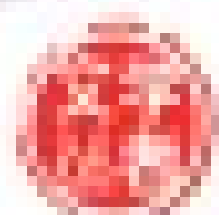
文学丛者
天津古籍出版社

XUE ZHE WEN CONG

明代

志怪传奇小说研究

陈国军 著



XINSHIJI 新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系列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

陈国军/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陈国军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696 - 277 - 8

I . 明... II . 陈... III . 志怪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827 号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

陈国军/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cbs@yahoo.com.cn

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2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 80696 - 277 - 8

定价: 34.00 元

序

李剑国

元明清三朝,就文言小说——主要是志怪和传奇小说——来说,唐人的辉煌已成过去。不过,宋代文言小说以《夷坚志》为代表的通俗化倾向,元代《娇红记》、《龙会兰池录》等长篇传奇小说的出现,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双峰对峙,都是文言小说自身的新发展,大抵具备某些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的特征。此间有明一代,文言小说的地位未免有些尴尬,总体影响似乎前不及两宋,后不及清代。这或许是历史实情,但更有一个现实实情是,通常人们对明代文言小说的关注和认识,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用王国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观念将明代定位为“小说时代”——尽管研究明代诗文的人对此表示反对——的话,那么不幸的是文言小说的光焰被白话通俗小说所掩,后者始终是小说史书写的主角,而前者常常被边缘化、矮化。问题不在于如何“婢作夫人”地把它扶上独尊地位,这不可能,而是如何恢复文言小说在明代曾有过的真实状况,发现和评估它的价值。就是说,倘若我们将明代看作一个“小说时代”时,需要清醒地知道“小说”二字绝非是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等构成,此中文言小说也曾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欣欣子序《金瓶梅》,胪列“前代骚人”《剪灯新话》等九

种,虽说是用作《金瓶梅》的对比而抑扬其间,但那实际都是当时阅读界流行的作品。除《水浒传》,其余八种都是文言小说;而除《莺莺传》,其余七种又都是明人作品!这就告诉我们,在明代前期的一百几十年间,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长篇白话创作尚还缺乏热烈的呼应时,文言小说竟是这一阶段小说界的主角。学者们的研究指出过,欣欣子序提到的九种小说,都曾被《金瓶梅》吸收为素材,比如《怀春雅集》有二十首诗词就被《金瓶梅》所袭用(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因而,这就又告诉我们,明代文言小说曾对通俗小说作家及其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纵观明代小说界,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大量以文言小说和笔记野史为主的汇编丛抄的编纂刊刻,虽说宋代已经有这样的现象,数量也不算少,典型代表是《太平广记》、《类说》等,但明代可说是发扬光大。从明初瞿佑编纂《剪灯录》开始,此后《古今说海》、《虞初志》、《艳异编》、《才鬼记》、《青泥莲花记》、《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情史》、《剪灯丛话》、《合刻三志》、《绿窗女史》、《五朝小说》、《重编说郭》、《顾氏文房小说》等等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和明代出版业的高度发达及书商的商业运作有关,和社会阅读的取向有关。小说借助于出版传媒的传播力量和导向作用大出风头,获得前所未有的荣光。这些小说汇编丛抄,对创作者来说无疑起着刺激和示范作用,像瞿佑编了《剪灯录》又创作《剪灯新话》,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瞿佑的《剪灯新话》曾产生巨大影响,在明代形成一个“剪灯”系列,甚至朝鲜、越南后黎朝都出现过模仿之作(金时习《金鰲新话》、阮屿《传奇漫录》)。《剪灯新话》多缀诗词,这似乎和元初宋梅洞《娇红记》有关,只是篇幅不长而已,而那些联翩而出的明代长篇传奇小说(或者称作中篇传奇小说,那是用今人的中篇小说概念),更是《娇红记》的直接模仿产物。长篇化、才子佳人化、诗词化的所

谓“诗文小说”的大规模出现,是明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要说明人对文言小说的贡献,这算是一点,明人把长篇小说文言小说这种新文体铺张扬厉,发挥到极致。

从数量上看明人文言小说不算少,不过如同明诗一样,明人文言小说模仿性太强,这就限制了它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但是,学术研究和阅读欣赏不同,我以为小说史研究是小说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一二流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综述。作为小说文化现象,小说创作、小说编纂、小说刊行、小说作家的活动、作家群的地域集合、流派的建立,小说理论的表达,如此等等都是观照对象,而且还要将这一切置于古代整个小说史,置于明代整个小说界,置于明代政治、学术、宗教、文学、文化、社会思潮的背景中考察,揭发一切小说现象的原因,阐释其深层的意义。在这样的目的之下,小说创作和非创作性的小说编纂,优秀作品和非优秀作品,文人创作和民间说唱,小说阅读和小说研究,小说刊行和其他传播途径,艺术努力和商业炒作,实在都没有高下远近之分,都为研究所必需。

也正因为如此,就文言小说创作及编纂本身来讲,对一切构成小说现象最重要因素的作品,必须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现存的小说文献资料不足以准确反映整体面貌,因此对散逸的作品也要作发掘、整理和考证工作。而对于作家生平,对于作品产生年代、刊刻年代以及版本等等,自然也要力求作出最为准确详尽的考证。这个基础工作不能马虎,不能草率,否则即便是单纯的小说史描绘,也不可能是完备和准确的,更遑论深入探求其变革规律。这就是说,小说史研究首先是文献研究。

近年,明代文言小说史研究有较大进展,陈大康先生的力作《明代小说史》对于文言一脉投注了很大的气力,改变了以往小说史以点代面、轻描淡写的格局。而陈国军博士此书乃又是明代文言小说史研究的专书,力图使明代文言小说获得最充分的表达,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是明代小说研究的新成果。这里不拟

介绍书中的具体意见,我只是想强调,这是一部颇见文献功力和理论功力的著作。从小说史建构理念上说,国军此书多维度地审视和诠释明代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显出纵横捭阖,视野开阔的特点。对于文言小说自身在文体学、叙事学、主题学等方面显示出的审美特征、承继和变革,国军给予高度关注,并做出富于思辨的理论阐述,可说是一部明代文言小说的文体学史、审美史。没有孤立的文学现象,一切都有外部的内部的联系和根据。因此,国军同时又非常注意从时代风气和思潮、文化生态、政治变化、文学渊源、地域关系等方面考察文言小说的方方面面问题,因而又不妨看作是以文言小说为核心的明代社会思想文化史。此书的另一大长处是文献性强,小说文献的发掘、爬梳和考据在书中随处可见,见出国军强烈的文献意识和考据功夫。比如对周静轩、《鸳渚志余雪窗谈异》、伪本《雪窗谈异》、《情史》等等的考据,都翔实缜密,颇有发明。

国军是我的学生。1989年他从安徽考入南开,做我的硕士生。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历史小说,洋洋十数万字,已经显出某些不同凡俗的特点。毕业后任教于武警学院,2001年以副教授和武警校官的身份重返南开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仍然是我。我们师生前后相处六年,感情深厚。我赞赏他的为人,诚实、热情、乐观,师弟师妹们都很敬重他喜欢他。我更赞赏他的才学和学术献身精神,他读书刻苦,兢兢业业,虽廊坊近在咫尺也不经常回家,师妹们常说师兄太用功了,头发都掉光了。我和他教学相长,切磋学术,在他就读硕士期间合作撰写了《瞿佑仕宦经历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和《瞿佑续考》(《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读博期间又合写了《赵弼生平著述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之所以选定为《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是因为他熟悉明代小说,而这恰好正可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我研究文言小说,自战国至宋辽金,宋以后无暇顾及。幸有我的另一位学生占骁勇(2002届博士)完成了清代文言小说研究,他的博士学位

论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已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国军研究明代,正可以连为一体。

国军的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和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在他毕业后还经常听到学术同行包括老一辈学者对他的称誉。如今他的论文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请我作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常想,师生之间是友情的联系,是学术的传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人师者,乐莫大焉。赋得一绝以赠,望国军勉之,勉之!

峦峰曾越百寻高,
志在驰骋一世豪。
休道祖鞭先已著,
山川犹有万千条。

2005年7月9日于南开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明初传奇小说创作的重振和新变(1368—1435)	(19)
第一节 明初传奇小说的重振和新变	(20)
第二节 信笔弄文:瞿佑的文人才性与反思之笔	(37)
第三节 精巧竞前:李祯的模拟之文与竞胜之心	(50)
第四节 持正去诞:赵弼的“迂腐”与“驳杂”	(66)
第五节 以道自得:明初杂传体仙逸浮谈	(77)
第二章 低落与萧条:志怪传奇小说的时代性消沉 (1436—1487)	(87)
第一节 禁毁与黜废:可畏的“清议之严”	(87)
第二节 狭小的展示空间与复苏的征兆	(101)
第三节 空山足音:弥足珍贵的《钟情丽集》	(108)
第三章 志怪传奇小说的全面复兴(1488—1521)	(129)
第一节 志怪传奇小说的全面复兴	(130)
第二节 吴中小说家群的初步建立	(161)
第三节 静轩现象:通俗与文言小说的沟通与建设	(178)
第四节 寓言体传奇小说:《东游纪异》与《中山狼传》	(212)
第四章 志怪传奇小说的兴盛前期(1522—1566)	(218)
第一节 嘉靖志怪传奇小说兴盛的文化背景	(222)
第二节 嘉靖传奇小说的味道:政治嗅觉与反思视角	(246)
第三节 嘉靖时期的小说汇编	(261)

2 目 录

第四节 中篇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定位	(292)
第五章 志怪传奇小说的全盛(1567—1620)	(340)
第一节 隆万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的盛况	(342)
第二节 “剪灯”类小说创作的绝响:《觅灯因话》的意义	(398)
第三节 拯世救俗的小说观念与志怪传奇小说的文章化	(412)
第四节 《绘园》的神灵世界和叙事方式	(448)
第五节 宋懋澄:以小说见证历史	(469)
第六章 志怪传奇小说的式微(1621—1643)	(481)
第一节 《雪窗谈异》与明代小说汇编的终结	(482)
第二节 志怪传奇小说评点与《情史》的出现	(494)
第三节 崇祯志怪传奇小说的审美取向与清初小说的衔接	(506)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520)
后记	(533)

绪 论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明代戏曲、通俗小说以及各类文言小说，共同完成了通俗文学由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转移。由不下百种通俗长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一型”为代表的大量拟话本，以及近七百种的各类文言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犹如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是明代文学的标志性文体类型。明代是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时代。所谓“小说时代”，是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由文学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突破，以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浸润人心，在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行为及其社会舆论方面成为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憚。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或

譬吾言为迂阔事情,是目睫之见也。^①

“小说时代”还意味着从小说的创作者到小说的出版、营销、传播及小说阅读的普遍性与大众性。小说——无论是创作、刊行、阅读还是社会反响——在明代才真正找到了主体的感觉。小说破天荒地拥有了与《史记》、《春秋》等儒家经典并驾齐驱的社会地位^②。

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不仅“讲史”、“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宋市人小说”等流派联袂而来^③,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小说作品,如明代四大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由于历代文人、百姓的喜爱,而获得了小说经典的崇高地位。“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会对那个传统中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持赞许态度;而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也归入中国小说的古典名作之列……这六部作品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拓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途径,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人最心爱的小说”^④。明代通俗小说占据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并因此成为小说研究格局中无可置疑的主流资源^⑤。这种三千宠爱集一身的非均衡研究格局,实际上自我阻塞了小说研究的进展和突破,使得现代学人不得不发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正俗》,《四部丛刊》本。

② 各小说史、文学史征引的李开先《词谑》、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就是小说经典化的著名例证。

③ 关于明代小说流派的命名、创作情况及其成就,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④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⑤ 见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以及李剑国《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程毅中《简述“五四”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专著和论文。

出“悬置名著”的呼吁^①。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就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鲁迅以“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②的三言两语,论述了276年历史的传奇、志怪的发展历程,并将之定性为唐人传奇与清初《聊斋志异》两座文言小说高峰的过渡和中介。嗣后的小说史、文学史研究,大抵源于陈规,不出鲁迅藩篱^③。但就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如何达成这种过渡,仍然是各类小说史、文学史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历史现状与它在小说史的应有地位,存在着令人诧异的落差。平心而论,对历朝创作最多、总数达694种之多的明代文言小说^④,视而不见,进而撰写各类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特别是文言小

① 郭英德《悬置名著——明代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第1版,第178页。

③ 中国小说史,时有新著。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陈善新《小说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叶秋社1927年版)、胡怀琛《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版)、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版)、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等1949年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小说史观、小说史体例、小说类型、分期、演变等方面,或自创体式,如张静庐,虽为第一部署名中国小说史的专著,但舛误过多;或效颦鲁迅,难以出新。新时期的小说史,如谈凤梁《中国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93年版)、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杨子坚《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梅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小说史丛书》系列各著作等,对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研究也未见深化。

④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曰“明代文言小说计有694种,为历朝最多者,其数量较多的各朝依序排列如下:清594种,宋361种,唐184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12页。

说史,无论如何也难以反映明代小说发展的实际和真相。

一、小说史上的“诗文小说”、“中篇传奇小说”与“小说汇编”

宋人志怪传奇由于“平实而乏文采”、“托往事而避近闻”,招致了致命的攻击和批评;元代(1279—1367)近90年的历史时空,留给明人的也只有《异闻总录》、《江湖纪闻》、《诚斋杂记》三数种志怪小说集,龙辅《女红余志》、伊世珍《嫫嬛记》、《绿窗纪事》等真伪莫辨的志怪传奇小说集,宋远《娇红记》、《龙会兰池录》,郑禧《春梦录》等三数篇中篇传奇小说,以及陶宗仪的大型小说总集《说郛》一百卷。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使命,首先就是要接续唐宋以来志怪传奇小说创作的文化传统。

应该说,明初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赵弼《效顰集》等传奇小说,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明代小说继往承来、续绝承亡的艰巨使命。三部传奇小说集续既绝于一线,复垦域藻绘,造意创新,使得传奇小说,在明、清两代,再次成为小说家族中的华彩篇章;而其与唐宋有别的“诗文小说”体式、篇幅曼长的中篇传奇小说体制,则是在重振中的新变。明初三部“剪灯”小说,具有传宗接代的巨大价值。这一价值的体现,对唐宋传奇小说来说,是久而不行的传奇小说,在明初重新回归人们的视听,儒林与市井对传统的传奇小说在阅读和创作上,再次充满了兴趣与冲动;而对明清以还的小说实践,则有着一股有形的昭示和规划之功。明初三部传奇小说集,梅鼎祚《才鬼记》卷一〇《滕穆醉游聚景园记》评曰“(两话)皆是乌有之谈。盖效唐人小说而未至者也,其后此类种种迭出,更不逮此矣”^①,亦指出了它们的源出、缺点,以及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存在。可能因为明初三部小说雅俗共赏,丰赡华腴、秾丽丰蔚的手笔,若虚若实、可幻可真、亦讽亦劝的情致,幽昧恍惚、凭虚驾幻、闲

^① 田璞、查洪德校注《才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67页。案此处梅鼎祚误将李、瞿两人的时代和作品对调。

诞倜傥的志怪,目眩心惊、绮丽婉媚、风情逸丽的乱世情爱,以及哀穷悼屈、抒愤写怀、适性自遣的“不遇情结”,而深受明代受众的喜爱,虽遭毁灭禁而不衰。明初三部小说的小说史价值,主要体现于“诗文小说”的创作体制和“剪灯”系列小说的出现。所谓“诗文小说”,是指在文言小说中除了小说情节发展、人物个性需要外,作者为了遣才逞兴、释怀写心,在小说的不少环节中广泛融进前人或自己的诗文创作,从而使得小说诗文的含量比例较传统的传奇小说有大幅度的增加,诗文在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的一类志怪传奇小说。“诗文小说”创作在明代中后期风起云涌,“此类种种迭出”,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李昌祺《剪灯余话》,赵弼《效顰集》,陶辅《花影集》,周礼《警心丛说》、《秉烛清谈》、《湖海奇闻》、《剪灯余话》,丘燧《剪灯奇录》,周绍濂《鸳渚志异雪窗谈异》,邵景詹《觅灯因话》等都是“诗文小说”的后裔。“诗文小说”流派,因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不同小说家创作动机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小说文本的内涵和意蕴或有不同。但散体叙事,韵文抒情,注重小说文章之美,诗文在小说中占据较大比重,也即小说语言诗笔化、小说内容侧重人情世态的情绪化、小说体制文章(古文)化、小说结构新巧化的审美取向,以及“用传奇法而志怪”的文体意识,大体是一致的。

在中国小说史体系中,传奇、志怪都是指涉颇广的概念和范畴。从小说的文体特征而言,传奇是指“文备众体”、“尽设幻语”、“作意好奇”和“假小说以寄笔端”,也就是具有综合性、虚构性、新奇性和寄托性的一类文言小说。传奇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它的“文备众体”,不仅体现在以“传”、“记”为题,间有诗句和以议论作结的外在形式上,它更巧妙地转化了杂纂小说中鬼神灵怪、奇人异士等的题材,在叙事细节上渗入浓郁的诗情,构造出清妙的叙事意境;在叙事语言上渐趋于骈丽化,构词华丽优美;在意旨上,则从不违治身理家、天下存亡之正道,一变而为关注于个人主体的人生

感慨。而志怪是指“粗陈梗概”，“偏重事状，少所铺叙”，“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自神其教”，也就是具有简朴性、诚信性和垂诫性的一类文言小说。志怪、传奇小说虽渊源有自，但两者“尤易出入”，纠葛也久。“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成为研治小说史者的心病。仔细推究两类小说的发生、发展的历时状态，我们不难发现，传奇和志怪的区别，不完全表现于篇幅的曼长或简短，文词的华艳或古朴；也不完全呈现于题材上的叙述现世人事，还是搜奇记异。两者分野的本质焦点是创作意识和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志怪和传奇都含有虚构的特质，但志怪因为顽强的宗教意识——诸如鬼神之实有，因果报应的灵验等——较传奇小说的幻设虚构，已经从创作意念上大大弱化了。与此相关，志怪小说借鬼神世界所渲染、所表达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诸如道教、佛教、民间宗教，诉诸传统的、系统化的、公众性的信仰。换句话说，对志怪小说深层意蕴的理会和解读，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诚信和理智化的宗教情结；而传奇小说的审美底蕴，无论是搜神记异，还是人间世界，抑或是人间现世的张扬鬼神，它倾诉着的是人类情感，是作者寄托着的、个性化的人文关怀。准此而言，“用传奇法而志怪”，则是将传奇小说所具备的综合、虚构、新奇、寄托等四大特点，以及篇幅、文词、题材、意念和审美等属性，与志怪小说的相关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志怪小说兼具传奇小说某种特质的小说技法、观念和文体。“以传奇法而志怪”，使得志怪小说同传奇小说在创作意识和审美趣味上有着某种趋同的倾向。“用传奇法而志怪”虽从宋代就萌其苗头，但经了明人小说——如《剪灯新话》、《西樵野记》、《高坡异纂》、《湖海奇闻》、《觅灯因话》等——创作实践，经过《万选清谈》、《才鬼记》、《幽怪诗谭》等小说汇编，不断地强化着这种小说观念与技法，并最终建构起来唐人传奇与清代《聊斋志异》间的转型与变异。